

世界的每一天早晨

茨维坦·托多洛夫

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过一场展览，名为“启蒙！明天的遗产”。展览的组织者正是茨维坦·托多洛夫（Tzvetan Todorov）。Télérama杂志专为这次展览出版过一期专号，而我们选的这篇文章正是在这一期专号上发表的。文章综述了茨维坦·托多洛夫2006年在罗贝尔·拉风出版社出版的《启蒙精神》最后一章中的主要内容。

启蒙精神是永恒的，见之于五洲四海的精神吗？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，政治当中就已经引入了理性。在孔子时代的中国，对知识的爱，也在人们的心目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。非洲的一个思想家从1615年便谴责了奴隶主义……后来，到了十九世纪，一些理性的运动在全世界五大洲大量出现。虽然这些思想并非为欧洲所特有，但是欧洲是这些思想的熔炉。而且还不仅仅是如此，启蒙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……

按照我们今天的描述，启蒙精神在其特点的确立上，是有问题的：时代不同，世界各大文明当中构成启蒙精神的内容也不同。然而，所谓启蒙精神，也是在一一定的历史时刻（在十八世纪），在特殊的环境当中（西部欧洲）形成的一个历史事实。

启蒙思想是普遍的思想，虽然我们并不是在全世界到处都能观察到，不是始终都能观察到这样的思想。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表示着启蒙思想的实践，也指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的认识。在公元前三世纪，我们在印度针对皇帝而提出的一些告诫，或者在皇帝颁布的法令当中，就已经看到一些启蒙思想的蛛丝马迹。在八到十世纪伊斯兰的“自由思想家”们的作品当中，在中国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宋朝儒学复兴当中，在黑非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反奴隶制度的运动当中，都表现出启蒙的思想。我们可以随意举几点来自天南地北的理论要点。

同一片领土上的人们信奉的多种宗教都主张宗教的宽容，比如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，中国的儒教和佛教，在后来成为伊斯兰势力范围的土地上存在着穆斯林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、琐罗亚斯德教，摩尼教；黑非洲也共同存在着伊斯兰教和不信神的传统。正如十八世纪欧洲的人们常常说的那样，我们在世界各处都注意到，与战争和迫害相比，人们更喜欢宽容。另外一个也许与此有关的要求是，必须将政治和神学，把国家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分别开来。人们希望，人的社会应当以纯粹人道的原则为基础来领导，所以世俗的权力应当由君主来掌握，而不是由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僧侣来掌握。

政治权力要有自主性，知识也要有自主性。比如，印度有一种思想，认为国王不应当屈服于传统，不应当屈服于星宿发出的预示或者表达的信息，而是只能服从于理性的思考。九世纪阿拉伯的著名医生阿尔·拉齐（Al-Razi）捍卫在理性控制之下的，来自经验的，严格地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知识。在中国，很多技术发明都证明在知识领域存在着自由探究的态度。伊斯兰世界在数学、天文、光学、医学等科学界所取得的进步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。

另外一个很普遍的特点是关于普遍性的思想。所有的人都有着平等的尊严，道德有着普遍的基础，因此人类具有统一性。印度的皇帝阿索卡（Asoka）在公元前三世纪便说：“没有什么上乘之活动可以造就全世界的善”。非洲反对奴役的斗争也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。阿赫迈德·巴巴（Ahmed Baba）1615年在通布图（Tombouctou）写了一部论著，为各人种之间的平等而辩护，同时他又说，奴隶制度的任何作法都是不正当的。

以我们认为是欧洲的启蒙精神为标准，我们随便罗列了一些表现；这些表现的作用有大有小，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。在印度，重理性思考，轻信仰和迷信的训诫，只是针对君主提出来的，而没有普及到整个民众阶层。虽然这种思想很接近启蒙的思想，但它仍然只能是人们称之为的“开明的专制”。从十世纪开始，穆斯林的自由思想家便受到了严厉的镇压。与启蒙思想最为接近的思想是中国孔子的教诲。孔子的思想从原则上涉及到的自然和人的世界，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和修行，使人不断完善自己。十八世纪欧洲的哲学家对中国的“模式”非常有好感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但我们应当承认，当时欧洲的哲学家对中国的认识相当粗浅。

这种多重的发展表明，启蒙的思想并非是欧洲所特有的，而是具有普遍性。然而，启蒙运动正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加速发展并进一步加强，启蒙的思想正是在欧洲得到了伟大的综合，然后才在五大洲传播开来：首先是在北美，然后又回到欧洲，发展向亚洲，非洲。我们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：启蒙思想首先开河的发展为什么是在欧洲，而不是在别处呢？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中国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我们不一定非要找出一个断然的说法（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现象，具有多种多样的，甚至是矛盾的原因），我们可以指出欧洲有，而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一个特点：那就是政治的自主性，人民和个人的自主性——必须在社会之内给人以地位，而不是在社会之外（印度放弃了世俗生活而修行的人，伊斯兰土地上狂热的信徒，中国的僧侣，这些人的地位就不是在社会之内，而是在社会之外）。欧洲启蒙运动的特点，就是为“个人”、“民主”这些概念的出现做好了准备。但是，如何解释这些思想只有在欧洲才能够蓬勃发展起来的呢？

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十分复杂的。但是有一个事实非常明显：那就是，欧洲既有单一性，又有多重性。而且启蒙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。他们注意到，欧洲的大国相互之间形成了某种体系，通过政治和贸易联系在一起，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普遍原则。然而，这些国家也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。而且这是不无理由的：各个大国都在利用这些不同。旅行以及在外生活一段时间，这在当

时不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作法，简直是必不可少的。孟德斯鸠（Montesquieu）在动笔撰写他的伟大著作《论法的精神》之前，认为有必要走遍欧洲，研究欧洲各地人民的风俗。苏格兰法学家和作家詹姆斯·包斯威尔（James Boswell）为了完善自己的教育，投身于走遍欧洲的旅游。而利尼的君主（prince de Ligne），奥地利陆军元帅，驻俄罗斯大使，用法语写作的作家，也曾细数过，说他曾三十四次旅行于布鲁塞尔到维也纳之间，在车上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：“不管到哪里，我都可以是一个外国人，我喜欢这种状态：在奥地利我是法国人，在法国我是奥地利人，在俄罗斯我既是法国人，又是奥地利人，这是一种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感到很高兴，但在任何地方又都没有依附感的好办法。”

外国可以是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也可以是我们逃避迫害的地方。各个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：普列服神父（abbé Prévost），伏尔泰（Voltaire），卢梭（Rousseau）在英国住过，休谟（Hume），博林布洛克（Bolingbroke），斯特恩（Sterne）在法国住过，温克尔曼（Winckelmann）和歌德（Goethe）去意大利，贝卡里亚（Beccaria）来法国。当伏尔泰，默佩图依（Maupeituis），拉梅特里（La Mettris）离开法国，去柏林寻求弗雷德里希二世（Frédéric II）的保护时，狄德罗（Diderot）却跑到俄罗斯去当卡特琳娜二世（Catherine II）的顾问。多样性本身就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好处；伏尔泰在比较了英国人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之后，得出结论说：“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最喜欢这三个民族当中的哪一个，但是，谁能感觉到这三个民族不同的优点，谁就是幸福的人。”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一幸福的原因。

应当说，与世界其它的地方相比，欧洲的不同之处，的确是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国家。欧洲的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一样大，然而，若将这两者相比，我们不能不对它们的反差感到吃惊：中国只是一个国家，而欧洲现在则有四十多个独立的国家。人们本来会以为分成这么多个国家，会是一种不利的条件，可是启蒙的思想家们把这一点看成是欧洲的优势之所在。他们认为与中国的比较是最能启迪人的心智的。休谟说：“中国在人的谦恭态度和科学方面好像有着重要的资源，我们本可以希望，在多少个世纪里会诞生一些比实际出现的事物更完美，更完善的东西。不过中国是个范围广大的帝国，全国只讲一种语言，只有一种法律，只有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。”

与古老的谚语“团结就是力量”所说的意思相反，分裂才是力量！休谟也许是第一个没有从大家都赞同的一个特点（罗马帝国遗产，基督教）来看待欧洲的思想家；他认为欧洲的特点是其内部的多变性。我们还要理解为什么“差别”，一种其本身具有负面意思的关系特点，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品质。

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，并提出了不同的答案。为什么宗教的多样性比只有一种宗教要好呢？因为如果没有选择的可能，就会出现霸主的地位，而这种地位很容易导致产生专制。但几种宗教的同时共存会刺激竞争，使人产生热情。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会成为优势呢？因为比较有利于批评的精神，能够动摇窃取的声音。休谟说，科学之所以在欧洲发展，那是因为“欧洲在全世界是划分得最为细碎的一个洲”。卢梭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在共和国内部，如何才能尊重舆论和政治选择的多样性呢？他的回答是，要建立起“普遍的意愿”；而“普遍的意愿”（volonté générale）与“所有人的意愿”（volonté de tous）有着很大的不同；“普遍的意愿”不是相似声音的相加，而是对差别的综合，是激励每个人都超越自己的个别观点，用康德（Kant）的话说，就是“设身处地地为其他的人着想”，这样，他就能够以共同利益的名义采取行动。多样性比单一性更好，其原因至少有三个：多样性能在竞争中导致宽容，能够发展并保护自由的批评精神，有利于超越自我，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将自我与他们整合在一起。

启蒙思想是欧洲最有价值的创造，如果没有欧洲这个既统一，又多样的空间，启蒙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。然而，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：正是启蒙的思想导致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欧洲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：没有欧洲，就不会有启蒙的思想；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：没有启蒙的思想，就不会有欧洲。

茨维坦·托多洛夫（Tzvetan Todorov）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的有：

《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它》（Mikhail Bakhtine. Le principe dialogique），天津百花出版社，2001年

《诗》（Poétique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《象征理论》（Théories du symbole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《话语的体》（Les genres du discours），北京百花出版社，2001年

《批评之批评》（Critique de la critique），北京三联书店，2002年

《失却家园的人》（L'homme dépaycé），三联书店，2004年

Revue des revues, sélection de juillet 2006

Tzvetan TODOROV: «Tous les matins du monde. »

article publié initialement dans le magazine *Télérama/BNF*, février 2006.

Traducteurs:

Anglais: A. Kaiser

Arabe: Amina Rachid

Chinois: Yan Suwei

Espagnol: Mónica Mansour

Russe: Alla Beliak

Droits:

©Tzvetan Todorov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

©A. Kaiser/Bureau du livre de New York pour la version anglaise

©Amina Rachid/Centre Français de Culture et de Coopération du Caire – Département de Traduction et d'Interprétation pour la version arabe

©Yan Suwei/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Pékin pour la version chinoise

©Mónica Mansour/Institut Français d'Amérique Latine pour la version espagnole

©Alla Beliak /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Moscou pour la version russe